

秦观词

〔北宋〕秦观 著 杨圆媛 评注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家藏文库

秦观词

〔北宋〕秦观 著 杨圆媛 评注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秦观词 / (北宋) 秦观著 ; 杨圆媛评注. — 郑州 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2016.1

(家藏文库)

ISBN 978-7-5348-5370-8

I. ①秦… II. ①秦… ②杨… III. ①宋词 - 赏析
IV. ①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48990号

家藏文库：秦观词

选题策划 卢欣欣 赵发杰

约稿统筹 卢欣欣

责任编辑 张 佳

责任校对 苏晓园

封面设计 王 歌

版式设计 曾晶晶

出 版 中州古籍出版社

地址：河南省郑州市经五路66号

邮编：450002

电话：0371-65788693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640毫米×960毫米 1/16

印 张 13.75印张

字 数 180千字

定 价 21.00元

前 言

北宋元祐八年(1093)，已经垂帘听政八年之久的高太后病故，哲宗亲政。哲宗九岁登基，但朝政大权一直掌握在高太后及旧党大臣手中，这位少年皇帝对旧党的专横无君之举十分不满。从亲政的那天起，坐在龙椅上的哲宗皇帝俯视着跪在面前的满朝文武，他知道，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天下了。他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罢黜旧党，起用新党，实行新政，这是一场旷日持久且影响很大的政治运动，史称“绍圣绍述”。

于是朝廷上下又重演了一幕几年前的“元祐更化”，只不过主角由旧党换成了新党，此时的新旧党争也已从政见之争转变为政治清算，政局在这位少年皇帝的手上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。昔日得势的旧党转眼间风光不再：司马光被追贬，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等旧党被贬斥。与此同时，新党蔡京、章惇等人相继回朝主政……在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里，三十多位元祐党人全部遭到贬黜，旧臣已死者夺其谥号，追贬官衔，苟活者则一概被贬到荒蛮之地。

注定要有人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，比如被誉为“宋一代词人之冠”的秦观。这位出生在江苏扬州高邮的词人原字太虚，后改字少游，别号邗沟处士、淮海居士，后人尊称他为淮海先生。

绍圣元年(1094)，这一年词人秦观四十六岁，这本是他实现人生抱

负的大好年华，但此时的他却遭贬出京，且活在人世间的时光已不太多。在这场时间长达三十五年、被贬人数多达三百零九人的新旧党争中，包括苏轼、秦观、苏辙、黄庭坚在内的旧党人物被一贬再贬，受尽折磨。

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清算，秦观先是被贬为杭州通判。当他还匆匆忙忙走在赴任的路上时，又以在国史馆增损神宗实录之罪，被雪上加霜地贬为监处州（今浙江丽水）酒税。在监察御史刘拯的眼里，秦观“游薄小人，影附于轼”（《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），务必要严加惩处。

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，旧党名臣刘摯被贬新州，死于贬所；名相吕大防被新党构陷，死于贬所；苏轼于绍圣元年被贬为定州太守，同年罢任，被贬往英州，后又连续被贬惠州、儋州。在新党对旧党大肆报复的行动中，身为“苏门四学士”、“苏门六君子”之一的秦观饱受磨难。

临行前，秦观重游友人王诜家的西园，抚今追昔，写下了这首《望海潮》（其三）：

梅英疏淡，冰澌溶泄，东风暗换年华。金谷俊游，铜驼巷陌，新晴细履平沙。长记误随车。正絮翻蝶舞，芳思交加。柳下桃蹊，乱分春色到人家。西园夜饮鸣笳。有华灯碍月，飞盖妨花。兰苑未空，行人渐老，重来是事堪嗟。烟暝酒旗斜。但倚楼极目，时见栖鸦。无奈归心，暗随流水到天涯。

几年前，也就是哲宗元祐二年（1087），秦观因苏轼等人的举荐，入京任职，并参加了在驸马都尉王诜府第举办的西园雅集，当时苏轼、苏辙兄弟以及“苏门四学士”等十六人参加了这次难得的盛会。这些文人吟诗对唱，风流俊朗，一时传为美谈，人们将这次聚会称为“西园雅集”。李公麟曾绘有《西园雅集图》，图中“幅巾青衣、袖手侧听者，为秦少游”（米

芾《西园雅集图记》)。

这次风云际会的文坛雅集在中国词史乃至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，同样也代表着秦观意气风发的一段人生，是他仕途较为顺达的一段经历。在苏轼等人的大力荐举下，他先后做过太学博士、校正秘书省书籍、秘书省正字、国史院编修官等，尽管其间也遇到一些小的挫折，比如多次参加科举才考中进士、被忌者中伤等。但是这样的好日子并未能维持多久，到了绍圣元年之后，这段美好的时光只能在梦中不时浮现了。

这首《望海潮》记录了秦观昔日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一起雅集的快乐时光，转眼间，他已沦为宦海浮沉的牺牲品。秦观以情景交融的方式抒写自己对前途迷茫的感叹，似乎也包含有隐居出世的心绪。词人在这首词中进行时空转换，从眼前的“梅英疏淡，冰澌溶泄，东风暗换年华”，到“长记误随车”，追忆昔日西园雅集的良辰美景；“兰苑未空，行人渐老，重来是事堪嗟”，又将思绪拉回到现在，呼应开头。今昔对照，时空交错，以一种迷离的方式揭示了政局多变在自己心中留下的阴影，悲惋动人。

秦观被贬后所任的监处州酒税不过是负责到市场上去征收鱼税、酒税之类。因官职小且处于流放时期，在处州生活的两年时间里，他一直没有固定的住所，寄居在一座寺庙中。这期间，秦观主要靠诵读抄写佛经、游览山水来打发时光，且谨小慎微，生怕再出什么差错。

即便如此，负责监视的人仍不放过他，“承风望指，候伺过失，既而无所不得”（《宋史·秦观传》），实在找不到什么过错，就以谒告写佛书、败坏场务等罪名将秦观削秩，贬往更加偏远的郴州（今湖南郴州），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，这一年是绍圣三年（1096）。

从接到再贬郴州诏书的那一刻起，生性敏感的秦观已经感觉到，自己这一次将是去无回，于是他留下一家大小二十来口，只带了儿子秦湛跟随自己匆匆南行。

二

一路顺江舟行，两岸的风光虽然美不胜收，但此刻的秦观哪有这份游山玩水的心，想起曾经的西园雅集，想起从前的轻歌曼舞，想起昔日的缠绵温情，心中的块垒不断郁结，难以排解。

路过衡阳的时候，故旧孔毅甫在那里做太守，他见到秦观之后感叹道：“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，殆不久于世矣。”（曾敏行《独醒杂志》）此时的秦观年纪虽然还不到五十岁，但看上去憔悴枯槁，已是老态龙钟，到了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的地步。“休言七十古稀有，最苦如今难半百”（秦观《自警》），他似乎已经看到死神的身影。

秦观匆匆于岁末抵达郴州，还没来得及领略潇湘一带的风物之美，就再次接到诏书，编管横州（今广西横县）。此时已是绍圣四年（1097）的春天。郴州在湖南境内，横州则属于广西。从湖南到广西无疑又是一次艰难的行程。

从绍圣元年离开京城，先是被贬杭州，继而处州，后又贬谪郴州，再到横州，四年时间里连续四次遭贬，从浙江到湖南，再到广西，越贬越远，处境也越来越艰难。在去横州时，秦观是被作为囚徒押解上路的。在如此不堪的境况下，他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《踏莎行》（郴州旅舍）：

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，砌成此恨无重数。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？

王国维在其《人间词话》中曾这样评价这首词：“少游词境最为凄婉，

至‘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’，则变为凄厉也。”在这首词里，秦观抒发了遭受流放、前途渺茫的愁绪，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融入到楼台、津渡、孤馆、杜鹃、斜阳等具体可感的物象中。全词从郴州料峭春夜的凄清景色写起，大雾迷茫，月色朦胧，桃源遥不可及，这些都是词人凄苦、迷茫心绪的写照，抒发了客居之悲、难解之愁，形象地写出自己背井离乡、漂泊天涯的无奈和悲伤。清人王士禛在《花草蒙拾》中称赞该词：“‘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留下潇湘去’，千古绝唱。”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，秦观的词风逐渐转为“凄厉”，诗歌也变得“严重高古，自成一家”（吕本中《童蒙训·诗训》），这种“凄厉”和“严重”是其经历与心境的形象写照。

一路艰难跋涉，秦观终于到达横州，寄居在浮槎馆，此时已是元符元年（1098）。

同年九月，秦观再被贬到雷州（今广东雷州），而且是被革除功名，永不叙用。此时的他屡遭打击，已经有些麻木了。

在雷州，秦观“灌园以糊口，身自杂苍头”（《海康书事》），屈辱偷生、居无定所的生活对他来说，已毫无生趣可言。

屡屡遭贬对秦观的伤害既有身体上的，更有心理上的。近代词家冯煦在其《宋六十一家词选·例言》中曾指出这一点：“少游以绝尘之才，早与胜流，不可一世，而一谪南荒，遽丧灵宝。”环境改变人，但这种改变是残酷的，它将一位“绝尘之才”改变成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。

早年的秦观也曾经意气风发过，他有着较为显赫的家世：“我本宗江南，为将门列戟。”（《送少章弟赴仁和主簿》）其名字由父亲元化公所起，元化公当时很是钦佩太学中王观的才学，就给儿子也取名为“观”，以此寄托自己的殷切期盼之意。遗憾的是，秦观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。自然，秦观不想让父亲失望，据《宋史·秦观传》记载：“少豪雋，慷慨溢于文词。举进士不中。强志盛气，好大而见奇。读兵家书与己意合。”他本人在《精

骑集序》中也说自己“少时读书，一见辄能诵，暗疏之，亦不甚失。然负此自放，喜与滑稽饮酒者游”。可见秦观性格中也有豪放的一面，而且还是很有政治抱负的，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词人。

《左传》云：“大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”这就是古人的三不朽之说。所谓立德，就是树立德业，即孔颖达所说的“创制垂法，博施济众，圣德立于上代，惠泽被于无穷”；立功即建立功勋，“拯厄除难，功济于时”；立言则是著书立说，“言得其要，理足可传，其身既没，其言尚存”。立德是圣人才能做的事情，如同天下众多读书人一样，秦观也有着立功的强烈愿望，从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可以看出这一点。遗憾的是千古文章未尽才，秦观始终未能得到建功立业的机会，反而陷入新旧党争的漩涡而不断遭到贬谪。

绍圣元年，也就是秦观被贬的那一年，他还写了一首《好事近》（梦中作）：

春路雨添花，花动一山春色。行到小溪深处，有黄鹂千百。

飞云当面化龙蛇，夭矫转空碧。醉卧古藤阴下，了不知南北。

该词上片呈现的是一幅春山远水的优美画卷，溪流潺潺，翠莺啾啾，下片则是一幅悠然自得的清幽景象。古藤阴下醉卧，看风云变幻，忘记身在何方。似乎超然物外，但隐藏在背后的悲怨心绪是可以分明感受到的，明人沈际飞看出了这一点，认为这首词是“白眼看世之态”，可谓知人之言。据说苏轼读到这首词“乃录本使藏之”，同为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黄庭坚也百感交集：“少游醉卧古藤下，谁与愁眉唱一杯？解作江南断肠句，只今惟有贺方回。”历经数年宦海沉浮，尝遍人间酸甜苦辣，一句“醉卧古藤阴下，了不知南北”，真的就能置身度外吗？

被贬南方后，秦观常常以一种凄凉悲惋的心境去回忆那些美好的往事，用一种愁苦无奈的目光注视着眼前的现实。每到一处都触景生情，悲从心生，难以自己。

元符三年（1100）正月，哲宗驾崩，徽宗皇帝即位。

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。不少旧党人物听到这一消息，都是老泪纵横，然而如此天大的喜讯并没有让秦观高兴起来。

此时的秦观身心憔悴，对前途已不再抱有什么期待和幻想，他甚至为自己写好了挽词，发出“荼毒复荼毒，彼苍哪得知”的悲叹。这一年，苏轼应诏回京，途经雷州时，特意去看望秦观。秦观早年敬仰苏轼，以《黄楼赋》见知于苏轼，苏轼称其有屈（原）、宋（玉）之才，并将他的诗作推荐给王安石。王安石也同样欣赏秦观，说他的诗清新似鲍（照）、谢（朓）。秦观一生追随苏轼，为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。在四学士中，苏轼最为欣赏秦观的才华。

远在异乡，师友相见，这本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情，但此时秦观的反应似乎有些漠然。这次见面后，秦观写下了这首《江城子》（其二）：

南来飞燕北归鸿，偶相逢，惨愁容。绿鬓朱颜，重见两衰翁。别后悠悠君莫问，无限事，不言中。小槽春酒滴珠红，莫匆匆，满金钟。饮散落花流水、各西东。后会不知何处是，烟浪远，暮云重。

笔下一派凄冷枯寂的气象。这首词据说也是秦观人生的最后一首词。

同年七月，秦观复职北还。得到准许北还的消息后，他写了一篇《和归去来兮辞》，“念我生之多艰，心知免而犹悲”，言语之间，悲楚难掩，这是其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。

北还途中，秦观在藤州（今广西藤县）华光亭病逝，终年五十二岁。

对他去世的情景，《宋史》是这样描述的：“放还，出游华光亭，为客道梦中长短句，索水欲饮，水至，笑视之而卒。”

得知秦观去世的消息，苏轼极为悲伤，“两日为之食不下”（《与欧阳晦夫》），感叹道：“少游不幸死道路。哀哉，世岂复有斯人乎！”（《宋史·秦观传》）他将秦观的词句写在扇面上，并题道：“少游已矣，虽万人何赎。”（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）几百年之后，诗人王士禛仍在为之感叹：“风流不见秦淮海，寂寞人间五百年。”（《高邮雨泊》）

就在秦观去世的第三年，掌管朝政的新党人物蔡京将元祐党人斥为奸党，并在京城的端礼门竖立一块刻有一百二十人姓名的元祐党人碑，秦观的名字赫然在列，位在余官之首，其文集印板全部被焚毁。这位不幸的词人直到死后都无法逃脱党争的政治漩涡。

三

有宋一代的词人中，秦观是有一番“伤心之处”的，这不仅指他在仕途上几多浮沉，贬谪流放，客死异乡，而且其作品也受到过一些人的误解，比如宋代两大词派豪放派、婉约派的代表人物苏轼、李清照都曾以不同的方式批评过秦观。

苏轼虽然很赏识秦观，但他也说过“不意别后，公却学柳七作词”这样的话（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），批评秦观与自己分别后，去向柳永学习作词；李清照则说秦观“专主情致而少故实，譬如贫家美女，虽极妍丽丰逸，而终乏富贵态”（《词论》），说他专讲情致，缺少史实掌故，如同贫寒人家的美女，虽然妍丽丰逸有余，但终究缺少高贵的气象。

这些批评有其道理，但也不够公允，缺少对秦观词作个性与成就的深刻了解。文学创作本来就需要转益多师，师法苏轼固然极好，但借径柳永

也未尝不可；使用故实固然有其佳处，但不用典故，纯用白描也未必就是缺点。再说秦观也不是“少故实”，比如其《望海潮》之广陵怀古、越州怀古两首都用了不少掌故，以至于明人沈际飞在《草堂诗余续集》中批评“词为故实拖叠所累”。当然每个人的喜好不同，对同一部作品的评价也会迥然不同。

秦观与黄庭坚、张耒、晁补之并称“苏门四学士”，这四人与苏轼亦师亦友，在填词上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苏轼的影响。就词的成就而言，秦观在四人之中是最高的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认为秦观的词“情韵兼胜，在苏、黄之上，流传虽少，要为倚声家一作手”。事实上，不仅在“苏门四学士”中，即便是放在有宋一代的众多词人中，能与秦观媲美者也是屈指可数的。如与秦观生活在同一时期的陈师道就认为“今代词手，惟秦七、黄九尔，唐诸人不逮也”（《后山诗话》）。后人对此有不同意见，但这些不同意见并不是针对秦观，而是针对黄庭坚的，多认为他的词作远不能与秦观相提并论，如清彭孙遹在其《金粟词话》中就很明确地说：“词家每以秦七、黄九并称，其实黄不及秦远甚。”冯煦亦有同样看法：“后山以秦七、黄九并称，其实黄非秦匹也。”（《宋六十一家词选·例言》）李调元更是提出“秦少游《淮海集》，首首珠玑，为宋一代词人之冠”。

因在填词方面的杰出成就和贡献，不少人奉秦观为北宋词坛的“正宗”。清代文坛领袖王士禛认可这一说法：“词以少游、易安为宗，固也。”（冯金伯《词苑萃编》）

说秦观词作是北宋词坛或婉约词派的正宗并非过誉之辞，将其放在自唐五代以来词的演进历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。词与“载道”、“言志”的诗歌不同，它是配合音乐歌唱的音乐文学，具有“娱宾遣兴”之功，出现于深宫幽院、青楼茶楼，流行于把酒侑觞之间，故有词为艳科之说，从一开始就带有缠绵多情、悱恻柔婉的特质，这既体现在题材内容上，也体

现在作品风格上。早期《花间集》所收词作不外青年男女的相思相恋、悲秋伤春。到李后主，将身世之叹、兴亡之感一并融入小词，有着深邃的寄托，具有一种幽微深婉、寄情纤柔的韵致。李煜以男女相思的描写寄托个人的不幸身世。清人张惠言对此颇为认同，提出词要“深美闳约”，应该表达“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，低徊要眇以喻其致”（《词选序》）。所谓“深美闳约”就是要委婉含蓄，有所寄托，讲究言外之趣、言外之韵。

词至柳永，有了显著变化，他将词的表现范围由狭小的上层社会扩展到市井民巷，又将小令拓展到长调慢词，一改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主导的局面，以自然朴素的风格打破晚唐五代以降的靡艳词风。但当时也有不少人诟病柳永，说他的词偏于直白而缺少余韵，比如王灼就在其《碧鸡漫志》中批评柳永：“唯是浅近卑俗，自成一体，不知书者尤好之。”意思是说柳永的词语意浅近，词风低俗，能自成一体，那些读书不多的人尤其喜欢他。

到了苏轼，再改柳永“浅近卑俗”之风，开创新的局面。他“以诗为词”，将词视为独立抒情的工具。据说，苏轼曾问自己的两位门生晁补之、张耒，自己的词和秦观的词相如何，两人都答道：“少游诗似小词，先生小词似诗。”（《王直方诗话》）两人通过与秦观的比较，点出了苏轼词的特点。

对上面所列举的几位词人，秦观均有所借镜，并能推陈出新，自成一体。

首先，他的小令、慢词深受唐五代词风的影响，论者认为秦观词风之“妙丽源于李太白、温飞卿”（谢章铤《赌棋山庄词话》），其词作手法“从唐、五代词得来者，观之可知变化之由”（陈匪石《宋词举》），这些说法还是颇有道理的。以其《浣溪沙》（其一）为例：

漠漠轻寒上小楼，晓阴无赖似穷秋，淡烟流水画屏幽。自在
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，宝帘闲挂小银钩。

这首词营造意境的手法颇似唐五代词。上片抒写佳人独上小楼的感受，在乍暖还寒的春日里，登楼的女子却感受到萧索枯寂的暮秋滋味，愁思不禁涌上心头。“淡烟流水画屏幽”，以画屏间的水墨风景烘托出深闺佳人飘忽不定的梦境。这首词的中心在过片一联，写女子卷帘后所见所感，敏锐地通过可感的飞花和丝雨来描摹春愁里的残梦。结句“宝帘闲挂小银钩”，一个“闲”字将境界全盘托出，写尽女子百无聊赖的神情和难以言说的愁苦，唐圭璋在其《唐宋词简释》一书中指出：“盖有此一句，则帘外之愁境及帘内之愁人，皆分明矣。”

词中用了一些轻灵、细巧的意象，如“轻寒”、“小楼”、“晓阴”、“淡烟”、“飞花”、“梦”等，用幽微的“词心”传达了一种“无边”的意境。全词语淡情柔，自然淡雅，笔墨细腻，如清人周济所云：“少游……意在含蓄，如花初胎，故少重笔。”（《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》）从“男子作闺音”的角度来看，这种闲愁不仅属于词中的深闺佳人，而且也属于秦观自己。

后世有人认为该词不仅像唐五代词，而且超过了唐五代词，如明人卓人月就认为该词可以“夺南唐席”（《古今词统》）。持这种观点的并不是卓人月一人，清人刘熙载在其《艺概》中也说“秦少游词得《花间》、《尊前》遗韵，却能自出清新”。可见秦观对唐五代词的借鉴不是简单的模仿，而是在得其“遗韵”的基础上进行创新。

其次，秦观曾学习柳永的填词之法，并有所创新。秦观在词的题材及风格方面受到柳永的较大影响，他不仅擅长写小令，而且将小令的写法融入长调的创作中，以幽微婉转、优雅醇正的风格弥补了柳永词作的浅显直白之弊，丰富了词的内涵，提高了词的品格，精致典雅，工巧流利，王国维在其《人间词话》中这样评说秦观词作：“少游虽作艳语，终有品格。”尽管是写恋情艳语，词也须有品格，不媚俗而高于世俗。秦观曾在《贺相公启》中说：“名既得功而立，位当与德而俱崇。”名声因事功而立，由此

获得的地位应当和道德一样高，由此可见其在品德上的要求。

最后，秦观也受到苏轼的影响。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思想层面，而非词的具体创作技巧上。苏门之中黄庭坚、晁补之对东坡词的接受和借鉴是显而易见的，如宋人王灼在其《碧鸡漫志》中所言：“晁无咎、黄鲁直皆学东坡，韵致得七八。”意思是说，晁补之、黄庭坚都学苏轼，并得其精髓。秦观虽然一生追随苏轼，但在填词方面受苏轼影响并不大，如词家陈匪石就说：“秦观为苏门四子之一，而其为词，则不与晁、黄同废苏调。妍雅婉约，卓然正宗。”（《宋词举》）秦观虽然是“苏门四子”之一，但其词风与晁补之、黄庭坚明显不同，也没有承袭苏轼的豪放词风，而是坚持婉约柔雅之调，可谓“自辟蹊径，卓然名家”（况周颐《蕙风词话》）。苏轼与秦观虽然词风不同，但他对秦观的词作很是欣赏，这种宽容和肯定对秦观来说无疑是很大的鼓舞和激励。

入宋之后，词逐渐发展成熟，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，一树多枝，产生了两个旗鼓相当的流派，一派写儿女情长，一派写壮志豪气，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婉约派和豪放派。明人张綖在《诗余图谱·凡例》中说：“词体大略有二：一体婉约，一体豪放。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，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。盖亦存乎其人，如秦少游之作，多是婉约；苏子瞻之作，多是豪放。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。”他以苏轼、秦观二人为代表，将婉约和豪放对举为词体的两大分野，而且以婉约为词体正宗，给予秦观以更高的地位。有这种看法的并不是张綖一人，如清人郑燮就明确指出“词与诗不同，以婉约为正格，以豪宕为变格”（《与江宾谷、江禹九书》）。

纵观唐五代至两宋时期的词史，就婉约派词人而论，其间共有三座高峰，分别是南唐后主李煜、秦观和李清照。秦观的词既有继承，又有开拓。陈廷焯在《白雨斋词话》中指出：“秦少游自是作手，近开美成，导其先路；远祖温、韦，取其神不袭其貌，词至是乃一变焉。”意思是说，秦观自是

填词高手，他近为周邦彦开路，是其先导；远承温庭筠、韦庄，取其神韵而不是简单模仿他们的形式，词至此而发生新的变化。陈廷焯看到了秦观继承前代文学传统的一面，也看到了其善于创新、自成一体的一面，给秦观以词史上应有的地位。

四

不少人指出秦观的诗写得像词，或说“少游诗似小词”，或说秦观的诗是“妇人语”、“女郎诗”（元好问《论诗绝句》），如宋人敖陶孙在其《臞翁诗评》中说秦观：“如时女步春，终伤婉弱。”意思是说秦观的作品如女子踏春，伤于婉弱。当然，这些话都是带有贬义的，不外讥讽秦观的诗过于儿女情长，过于纤巧，如同填词，写得不像诗。对此钱锺书在其《宋诗选注》中曾为秦观进行辩护：“‘时女游春’的诗境未必不好。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、千门万户，绝不仅仅是一大间敞厅。”说得很有道理，文学创作本来就应该丰富多样，不拘一格，再说以词入诗，如同以诗入词，未尝不是一种艺术上的有益尝试和创新。

这同时也说明秦观的作品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，这种特色不仅体现在其词作中，也同样体现在其诗歌、散文中。无论秦观的诗、词还是文章，都是发自其纤细敏感的内心，大多写得情真意切，带有感伤色彩，这决定了其作品的风格是统一的，具有共性的，那就是细腻柔婉，含蓄深沉，有论者称秦观的词作“托兴尤深”，“寄慨身世”（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），可谓的评。这种风格的形成与秦观一生坎坷曲折的经历有关，清人周济在《宋四家词选》中说秦观“将身世之感，打并入艳情”。即便是写艳情，因有个人的独特人生体验，也会写得与众不同。这种身世之感通过他的词表现出来，也通过其诗、文表现出来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秦观的诗、文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词作，而且也是相当出色的，曾受到苏轼、王安石等人的赏识，闻名于世。其诗精致细腻，清新流丽，非“女郎诗”一词所能概括；其文特别是策论长于议论，独出心裁，卓有见识，《宋史·秦观传》称秦观“长于议论，文丽而思深”，朱东润亦称其文“皆深造而有得，不为世俗之言”（《淮海集笺注·序》）；他不仅“少时用心于赋，甚勤而专”，而且“论赋至悉，曲尽其妙”（李廌《济南先生师友谈记》），可惜这些皆为其词名所掩，未能受到人们的充分关注。前人早已指出这一点，如明人胡应麟云：“秦少游当时自以诗、文重，今被乐府家推作渠帅，世遂寡称。”（《诗薮·杂编》）清人王初桐亦云：“少游文字学西汉，又能自成一家，而世亦但称其歌词，总由子野之诗必不如子野之词，少游之文必不如少游之词，故为词所掩耳。”（《小卿嬛词话》）

近代词家况周颐在其《蕙风词话》中说：“吾听风雨，吾览江山，常常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在此。此万不得已者，即词心也。而能以吾言写吾心，即吾词也。”词心是古人论词时常使用的一个术语，按照况周颐的解释，就是观览风雨江山时所激发出的一种不能自己的创作激情，它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，而非雕琢修饰、卖弄才情营造的矫情。“以吾言写吾心”则强调词人要用自己特有的言语抒写个人独特的心灵与情感。

近代词家冯煦在其《蒿廬论词》中论秦观之词时使用了这一术语：“他人之词，词才也；少游之词，词心也。”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，他们认为秦观的词最具词心，具体说来，就是秦观在词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写出了个人独特的情感，这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。其词作以情取胜，正如李清照所说的“专主情致”。

王国维在其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：“五代、北宋之诗，佳者绝少，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，即诗词兼擅如永叔、少游者，词胜于诗远甚。”意思是说，五代、北宋时期的诗歌少有佳作，而词则进入其鼎盛时代，即便是诗词兼